

宋之的评传



5.6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宋之的评传

尹 骥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B

496621

宋 之 的 评 传

尹 冀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都庄东街1号)
锦州市农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ISBN 7—81004—058—8/J2

1092×787毫米1/32 印张 $5\frac{1}{2}$ 12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550册 定价 2.10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在左翼的旗帜下	6
一、道路的选择	6
二、初试锋芒	11
三、《罪犯》	19
四、《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29
五、《武则天》	36
第二章 置身于抗战的激流中	47
一、救亡演剧队和“时事煽动剧”	47
二、《全民总动员》《国家至上》	56
三、晋东南之行及其“报告剧”	62
四、历史的再认识	67
第三章 向现实的深处开掘	78
一、《雾重庆》	78
二、《刑》	88
三、避难香港	92
四、在中国艺术剧社	95
五、《戏剧春秋》及其他	106
第四章 在自由广阔的天地里	117
一、奔向解放区	117
二、《群猴》《故乡》	122
三、在哈尔滨	128

四、带笔从戎.....	137
第五章 为新中国奋斗到最后一息.....	140
一、致力于部队文艺事业的建设.....	140
二、《打击侵略者》《保卫和平》.....	148
三、密切地关注社会主义的命运.....	154
四、深情地追溯民主革命的历史.....	157
五、壮志未酬.....	163
结束语.....	165
后 记.....	170

引 言

从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中期，宋之的是一位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著名的剧作家和散文作家。他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在文艺阵地上驰骋搏击了二十多年，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发挥过积极的重要的社会作用。他为中国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事业，首先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的戏剧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九五六年四月，宋之的不幸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二岁。在悼念这位著名的作家时，文艺界对于他的战斗的一生及其文学的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一代文学宗师茅盾在宋之的墓前举行告别仪式时的讲话中曾这样指出：

宋之的同志是杰出的剧作家。他的逝世，是我们文艺界，也是我们国家的很大损失。宋之的同志自他投身于戏剧事业，就是站在战斗的最前列的。他是共产党的优秀的文艺战士之一。他开始创作活动，不过二十来岁；他的创作活动是和二十五年来我国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他的一生，都是为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而服务的。^①

茅盾的这个讲话不仅充分肯定了宋之的的文学业绩，赋予他“杰出的剧作家”的赞誉，而且准确地概括了这位作家文学道路的鲜明的特点：作为共产党的一个优秀的文艺战士，

^① 《解放军文艺》1956年5月号

他的创作活动始终紧密地联系着现实的斗争，目的是为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

宋之的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二十多年间，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如果从一九三一年宋之的参加左翼文艺活动算起，到一九五六年他逝世，刚好是“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正是在这一历史期间，中国发生了许多如茅盾所说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粉碎了反革命的军事和文化的双重围剿，使星星之火再度形成燎原之势；经历了长征的血与火的锤炼后，中国革命终于步入了健康的成熟的轨道；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三年解放战争，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历史，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的巩固人民政权的重大事件；在基本结束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之后，我国人民又开始了新的更加伟大也更加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并且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上述二十五年间这一系列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极为辉煌壮丽的一页，显示了这个充满艰难曲折和历史巨变时代的特色。

作为一个优秀的文艺战士，宋之的自觉地把自已的创作活动同这个历史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大事件”紧密联结在一起，积极地追踪着历史的进程，在自己的创作中迅速地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重大事件，并且以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爱憎表达了对现实的态度，这就形成了他的创作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几乎所有的创作都是为了配合现实的政治斗争，并积极为之服务的。这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一贯的文

艺思想和创作观念，即：文艺是战斗的武器，是革命的宣传工具。可以说，他在实践上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①

宋之的按照自己的创作观念进行写作，坚定不移，从不转向。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要求高于一切，优于一切。为了战斗的需要，他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入创作。虽然因此不能在艺术上刻意追求和反复锤炼，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而急就成篇，但也情愿把它拿出来，积极地投入火热的斗争，作出自己的奉献。

宋之的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他在二十余年紧张的生活和战斗的环境中，在担负着许多繁重的组织领导和行政事务工作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坚持创作。他的主要的创作成果是在戏剧领域内，计有多幕话剧十八个（其中有八个是与别人合作的），独幕话剧十七个，戏曲剧本三个（其中一个是与别人合作的）。此外，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十四篇，报告文学十一篇，以及更多的散文，随笔等，总计字数约二百五十万。毫无疑问，这些创作成果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是现当代文学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这些创作成果，特别是其中的戏剧创作，不仅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一部分概貌，而且由于它们都是直接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生活的，又和这一历史时期内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紧密地联系着”，因而使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到那一历史时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代革命发展的某些侧影。因此，宋之的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他的大量剧作，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然而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无可讳言的事实是：曾经是一位优秀文艺战士的宋之的和他的大量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地位和现实中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似乎是在逐渐地减弱和不断地缩小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了再版的机会或是失去了再版的价值。他的大量的剧作，包括某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剧作，也大都丧失了艺术的生命力而很难再现于舞台。并且，这种被冷落被遗忘的趋势随着历史的发展似乎还在延伸着。还应当提到的是，学术界和文学史家们对于宋之的（当然并不限于宋之的，还有与他相似的作家）创作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紧密配合现实政治任务的作品，例如抗战剧作中的“时事煽动剧”、“报告剧”之类，究竟是否算作文学艺术作品，早就有人提出了异议，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定论。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言而喻，宋之的及其创作并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孤立的现象。正相反，他的文学道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条文学道路既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也是一定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文艺政策指引下的产物。考察和研究这条文学道路的特点及其历史的得失时，必然地要涉及到文艺与现实生活、文艺与政治关系以及文艺的历史使命、文艺的社会功能等这样一些关系到文艺的本质属性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很复杂很难简单回答的，然而它们又是客观存在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不可能回避。因此，尽可能深入地探讨和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并且从中获得某些规律性的理论启示，以利于现

实文艺事业的发展，这应当是我们的责任。虽然这种探讨与总结未必能做到正确无误，更不可能得出某种统一的使人们都能接受和同意的结论。但探讨和总结本身总归是有益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我们选择了宋之的及其文学道路这样一个课题。试图通过对这位作家和他的创作的具体评述，一面是希望能够对他在文学上的业绩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比较客观的和公允的评价，一面则希望能够从这一个具体的作家及其创作的探讨中获得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和启迪。

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①为了不至于“说梦”，我们将努力遵循鲁迅这一教导来评述宋之的的一生及其创作的道路。

①《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第一章 在左翼的旗帜下

一、道路的选择

一九三一年，北平。左翼文艺运动在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着。正在北平大学第三院读书，年方十七岁的宋之的积极地投入了这一运动，走上了一条献身革命文艺事业的战斗的道路。

一个被当时的人们认为前程似锦的大学生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充满着荆棘和危险的道路呢？

宋之的 原名宋汝昭，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宋家口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丰南位于冀东，和天津、唐山、乐亭、昌黎等地临近，北依燕山山脉，南临渤海之滨。人口稠密，经济比较发达，并素有革命传统。早年的义和团运动曾在这里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二十年代初，这里又燃起了革命的星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在这个地区展开了活动。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亲自到他的家乡乐亭一带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秘密工作。一九二二年秋，著名的唐山开滦煤矿和启新水泥厂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有数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事件震惊了全国，也对它周围的农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定的历史和生活环境，不能不影响到少年宋之的的成长。严酷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苦难，给

宋之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之后，宋之的在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控诉》和《孩子回来了》里，就曾将他在家乡农村所接触的社会生活情景形象地反映出来。他以深沉和激愤的感情描述了家乡农民的不幸命运，并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一九二五年，宋之的离开了贫困多难的家乡到了遥远的伯父家里。在伯父的关怀和照应下，他进了那里的铁路工人子弟学校。从偏僻的丰南农村来到城市之后，宋之的打开了新的视野。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正在发展着的劳工运动，向他展示了新的人生的画面。铁路学校的学习生活，不仅使宋之的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不断长进，而且使他在社会与政治思想方面受到了许多新的启迪。他开始接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接触到进步的文艺作品。一九二九年，因绥远局势动荡，宋之的被送回家乡，并就读于进步思想和革命力量比较活跃的车轴山中学。

一九三〇年春，年仅十六岁的宋之的为了谋求新的生活出路只身来到了古都北平。这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凭着自己努力学习所得的优异成绩，虽然没有正式中学毕业文凭，却以同等学历的资格，于暑期考进了北平大学第三院俄文经济系，成为这个系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宋之的，虽然成了当时一般世人所羡慕的大学生，但是，他的大学生生活却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当时，进入北大三院（法学院）的学生，情况很不一样。有的人一心投拜名师，攀附名流，也念点功课。他们期望着名人的提携，沿着“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达到出人头地目的；有的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念教科书，按部就

且听课，做笔记，挣学分，期望着拿到毕业文凭，在社会上找到饭碗，站住脚；也有的人，原是富家浮浪子弟，他们本不期望学到什么，整日逛逛悠悠，进饭馆，游公园，捧戏子，交朋友。他们只是为了混个大学招牌而来，功课敷衍了事。反正有钱，一纸文凭也不难到手。宋之的和上述大学生不同，他过的是另一种大学生生活，走的是别一条路。他没有闲情逸致东游西逛，也不去拜谒名流，聆听宏论。但他也不到教室去听课，捞学分。他对法定的教科书似乎没有多大兴趣，却把自己关在学生公寓的一间狭小屋子里，埋头阅读那些范围广泛的课外书籍。他在这里不过是借得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整天贪婪地读着一切能够搜罗到的社会科学书刊，尤其是进步的文艺书刊。

宋之的所以潜心于进步的社会科学，尤其潜心于进步文艺的学习，是有他个人的历史渊源的。在中学时代，他就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喜欢阅读中国的一些古典文学名著，更喜欢阅读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和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文学作品。进步的文艺作品使宋之的打开了新的眼界。他从这些作品中，初步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也认识到了文学自身的作用与价值。

时代的激励，是推动宋之的选择人生道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深，又正是中国革命经历了低潮之后走向新的高潮的时期。中华民族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宋之的进大学的第二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矛头已经深深扎进了祖国的肌体，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的抉择。可是，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竟置民族的危亡于不

顾，在竭尽全力地大打内战，妄图消灭正在形成燎原之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蒋介石政府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际上助长着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爱国的热血青年，对于祖国面临的危亡局势，无不十分关切。爱国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被卷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当时内战连年不断，灾荒遍及各地，城乡经济是一派衰微破败景象。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一九三〇年的长江流域大水灾，给中国的民族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加深着人民的苦难。这一切，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深广的忧愤。正直的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更是异常苦闷，忧心忡忡。他们很难安心坐在教室里念书。他们关切地注视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也为自已个人的出路与前途担忧。他们渴望着有一条新的生路。

宋之的就是这些爱国的热血青年的一个。他疾恶如仇，刚正爽直，富于正义感。内忧外患的形势，使他忧愤不已。他深深地思考着，自觉地阅读进步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艺的书刊，从中吸取营养，开拓思路，以寻求和选择自己的道路。逐渐地，他把人生道路的选择同对革命文艺的热爱联系在一起了。他从革命文艺作品中认识了社会和人生，同时也从切身体会中认识了文艺对于人，尤其是对于青年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启示作用。他自己读文艺作品常常就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于是他认定了走文艺这条路，献身革命文艺事业，用文艺来为国家民族和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应是他人生道路的最佳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有幸认识并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

文艺界的朋友和同志，其中的两位共产党员给予他的启示，对于推动他在革命文艺道路上的前进步伐，具有重要作用。

最早成为宋之的的朋友和同志，并且引导他一起参加革命文艺实践活动的，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的于伶同志。于伶也是北大三院的学生，当时已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关心着周围的同学，尤其关心有进步倾向的同学。他和宋之的住在同一座公寓里，相隔很近。宋之的出入都要从于伶的门前经过。当宋之的发现于伶那里经常有一些左翼的文艺刊物，如《拓荒者》《海燕》等时，他被吸引住了，并认定这位比他年长的同学可能是他的志同道合者。于是，他们彼此接近起来。从交换阅读书刊，到互相促膝谈心。终于，由普通的交往，到逐渐加深了解，到成为同一战线上的战友，直到成为终生的莫逆。

当时也是法学院学生，比宋之的高两班，已经是北方左翼文化组织领导成员之一的陈沂同志，也在这时结识了宋之的，并且相互建立了很深的友情。

在于伶、陈沂同志的引荐下，宋之的被吸收加入了处于秘密状态的北方左翼文化同盟组织。从此，他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实际革命活动。他从一个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埋头读书的学生，变成了一个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并且很快地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活跃分子，成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勇猛奋进的革命文艺战士。

二、初试锋芒

道路一经择定，就迅速付诸行动。

一九三一年秋，“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在一次集会上，商讨成立学生抗日会事宜，并准备派出代表赴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这次集会上，宋之的挺身而出，第一个跳上讲台，痛切地陈述了广大学生的正义主张。当他的发言遭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控制下的一个反动学生的反对时，他又再次登上讲台予以反击，进一步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讲。他的富于逻辑性和鼓动性的演讲，把那个反动学生驳得无言以对，同时赢得了广大同学的热烈掌声。在这次集会上，宋之的可以算是锋芒初试，表现不凡。从此，他在北大法学院就颇引人注目了。

作为一个爱国的大学生，宋之的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各项政治活动。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进步的文艺活动方面，特别是左翼的戏剧活动。他把对革命的追求和对文艺的挚爱结合在一起，决心以文艺为武器，运用文艺的特有力量参加政治活动，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因此，当他参加左翼文艺活动时，总是充满着政治热情，表现出了一个战士的勇猛姿态。

从一九三一年秋到一九三三年春这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宋之的在党所领导的左翼剧联统一指挥部署下，积极参加左翼戏剧活动，并且担负了一部分组织领导工作，成为当时左翼戏剧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在此期间，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好几个左翼戏剧团体，包括“阿莽剧社”、“苞莉芭剧社”、“新球剧社”、“新兴剧社”等。这些剧社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左翼剧联出面组织领导和开展活动的。其成员多数是青年学生。这些剧社的建立都肩负着一定的政治宣传任务，演出的剧目一般也是由左翼剧联供给的进

步作品，或是外国的但对中国的现实或多或少有借鉴意义的作品，其中以田汉的作品为最多，也有一些是由于伶等青年作者自编的。这些剧社的演出活动，对于推动当时的学生运动，对于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宋之的积极参加这些剧社的活动，他和于伶、张季纯等人一起担负了具体组织领导工作。

“苞莉芭剧社”的建立与定名表明了宋之的是自觉地把戏剧活动当作革命斗争的事业来看待的。那是一九三二年三月间，北大法学院一部分进步学生决定用纪念高尔基的名义建立一个新的左翼剧团。当大家集会讨论给这个剧团定名称时，参与筹建的宋之的提出用“苞莉芭剧社”这个名字。大家都懂得这名字是俄文“斗争”一词的译音。但在每个汉字的头上又被加上了一个草字头，以表示这名称不过是些花花草草的意思。宋之的说，这些花花草草便于遮掩，可以迷惑反动当局，便于登记，取得合法的地位。然而它的实质，却是要斗争，要用戏剧这武器去进行革命斗争。宋之的提的名称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因为这不但体现了他们善于斗争的艺术和灵活性，更反映了他们敢于斗争的坚定性和原则性。斗争，这就是宋之的和他的战友们从事戏剧活动的目的和态度。这个富于革命性和鼓动性的名称，不仅体现了这个剧社的具体奋斗方向，而且也正是宋之的本人后来终生从事戏剧活动所贯穿的基本精神。

宋之的在他所参加的各个戏剧团体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极其活跃的角色。从行政组织领导到具体演出事务，从出头露面办“外交”到默默无闻干内勤，他都全力以赴地去做。他同时还是一个随时被分配扮演各种角色的领